

# 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對日 人權外交的啟示

## ——寫在日本開國150周年之際

• 陶德民

### 前 言

今年3月31日，是標誌着幕末日本由「鎖國」轉向對外開放的《日美親善條約》簽訂150周年的日子。4月25日，是明治維新的先驅吉田松陰潛入來訪的美國旗艦偷渡被拒150周年的日子。近幾年來，日美兩國均有學者出書和召開學會，博物館舉辦展覽，電視台播放特別節目以紀念這些歷史性的事件。最近日本小泉政府在美國總統布什 (George W. Bush) 敦促下派兵伊拉克，也引起了各方面對近代以來日美關係種種演變的重新思考<sup>①</sup>。

筆者在前年秋天和去年春天兩度訪問耶魯大學斯德林紀念圖書館的檔案部，並有幸在《衛三畏家族文書》中找到《日美親善條約》談判的一些原始記錄以及吉田松陰遞交美方的〈投夷書〉<sup>②</sup>。對我來說非常有趣的是，這些文件竟有不少是用東亞的「拉丁語」即漢語寫的。因為當時美方沒有懂日語的翻譯，日方也沒有懂英語的翻譯，結果，談判是以漢語和荷蘭語為媒介來進行的。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

培理 (Matthew C. Perry, 1794-1858) 將軍在1853、54年兩次遠征日本之前，先在澳門僱用了通曉漢語並略通日語的衛三畏 (Samuel W. Williams, 1812-84) 為首席翻譯，然後在上海僱用了一名荷蘭語翻譯。而日本已有千年以上的漢學傳統和近兩百年的蘭學傳統，自然不乏漢語和荷蘭語的人才。加之近世外交文書一直由所謂「林大學頭」，即世襲最高學府昌平黌之校長職位的林家當家人以漢文作成，故1853年第十代大學頭林健便受命翻譯漢文版的美國總統國書，死後則由第十一代大學頭林緯擔任1854年談判的日方首席代表。

衛三畏隨同培理訪問日本之前，已在澳門經辦一家教會印刷所達二十年，參與編輯《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 並出版了《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是一個中國通。不過，他雖然可以閱讀漢文，卻無法以漢語作文，對書法也無自信，所以在1853年隨訪時僱用了他的中文老師謝某為秘書。不料謝某這個鴉片鬼本來身體虛弱，在航海途中仍然偷食鴉

今年是標誌着幕末日本由「鎖國」轉向對外開放的150周年，也是明治維新的先驅吉田松陰潛入來訪的美國旗艦偷渡被拒150周年的日子。筆者在前年秋天和去年春天兩度訪問耶魯大學斯德林紀念圖書館，有幸找到《日美親善條約》談判的一些原始記錄以及吉田松陰遞交美方的〈投夷書〉。有趣的是，這些文件竟有不少是用東亞的「拉丁語」即漢語寫的。

美國派遣艦隊率先打開日本國門，主要是出於以下幾項經濟因素。第一，為了和英國等列強爭奪亞洲市場。第二，西進運動抵達加州以後，建立太平洋航線以通向中國大陸已成為趨勢，而日本正是理想的中途站。第三，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捕鯨船不僅需要從日本補給煤炭和淡水，而且希望在發生海難事故時在日本海岸得到救援。

片，故在逗留琉球之後、抵達日本之前便去世了，把培理急得要命<sup>③</sup>。幸好謝某死去之前已經把美國總統的國書譯完了，所以還不算誤了大事。因為培理的對日外交原本打算分兩步走：1853年先遞交國書，促使日本考慮放棄鎖國政策，並相約次年再來，以正式締交條約。1854年再訪時，衛三畏僱用了廣東南海人羅森（字向喬）為秘書。羅森在鴉片戰爭中組織過平英團，因清政府未給他記功褒獎，憤而出走香港。他曾為英國當局做秘書和翻譯，在中環一帶得了地產，並做些生意。由於他善於吟詩作文並長於書法，在日本大受歡迎，經其題辭的扇面達一千多柄，至今猶有遺存。衛三畏對他的翻譯工作以及緩解美日間緊張氣氛的親和作用也大加讚賞，倚為左右手<sup>④</sup>。羅森訪日歸來以後，其《日本日記》英文版（衛三畏所譯）於1854年9月11日在《香港記錄周報》（*Overland Register and Price Current*）刊出，引起西方人士的極大關注，因為其中收錄了日本官員平山謙二郎致羅森的信件，透露出日本採取鎖國政策的一個原因是德川幕府恪守孔孟的「義利之辨」，認為「萬國交際之道，宜首講此義」，即「有無相通，患難相救」，而不願捲入西方的「貿易競利」，以致「人欲爭狼」而成「虎狼之交」<sup>⑤</sup>。同年11月，日記的中文版在香港英華書院出版的月刊《遐邇貫珍》分三期連載，也備受各方矚目，因為它頗為細緻地描繪了日本開國的過程<sup>⑥</sup>。培理在讀了日記的英文版後，認為這反映了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對其使命的理解，並把它作為附錄收入美國國會文件《培理艦隊日本遠征記》<sup>⑦</sup>。

關於以上這些事情，筆者已另有專文討論。這裏想以《日美親善條約》

的簽訂及「吉田松陰偷渡事件」的處理為例，對當時美國的對日人權外交作一分析，以便對近代以來東西方交涉的一個重要方面重新加以認識<sup>⑧</sup>。

## 一 導致《日美親善條約》的人權問題因素

十九世紀中葉是美國對外膨脹節節勝利的時期，也是美國人篤信所謂「擴張乃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時期。一般認為，美國派遣艦隊率先打開日本國門，主要是出於以下幾項經濟上的因素。第一，鴉片戰爭以後，美國為了和英國等列強爭奪亞洲市場，企圖把美中《望廈條約》適用於日本以拓展通商範圍。第二，西進運動隨着美墨戰爭和淘金熱潮在1840年代後期抵達加州以後，建立太平洋航線以通向中國大陸已成為趨勢，而藏有煤炭的日本正是理想的中途站。第三，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捕鯨業184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階段，單是在日本近海作業的捕鯨船每年不下三百艘。這些船隻不僅需要從日本補給煤炭和淡水，而且希望在發生海難事故時在日本海岸得到救援。

這些經濟上的因素當然是推動美國遠征日本的主要動機。然而不可忽視的是，與第三項因素中的海難救助相關的人權問題，以及人權問題所隱含的東西方之間宗教文化的差異問題等，在美國對日外交中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並形成打開日本國門的一個突破口。1853年7月16日，在培理將軍初訪日本、遞交美國總統國書的一周之後，衛三畏曾從江戶灣給其在土耳其傳教的弟弟衛廉士（William F. Williams）寫了一封長信，其中毫不隱晦地指出<sup>⑨</sup>：

培理告訴〔日方〕官員，他將在次年率領一支更大的艦隊，以求得到他們對所提要求的回答，即所有前來訪問或遇難流落日本海岸的美國人應得到善待，美國汽船在一個〔日本〕港口得到煤炭以及有關物資的補給。這些是我們花費巨大開支和派出強大艦隊到日本水域的表面的理由，而真正的理由是為了提高我們民族的名譽和得到稱揚我們自己的材料。在這些理由的背後並通過這些理由，存有上帝的目的，即將福音傳布給所有國家，並將神旨和責任送達這個至今為止只是在拙劣地模仿耶穌之真的民族。我十分確信，東亞各民族的鎖國政策決非根據上帝的善意安排，其政府必須在恐怖和強制之下將之改變，爾後其人民或可自由。朝鮮、中國、琉球和日本必須承認這唯一活着的和真實的上帝，他們的鎖國之牆必將為我們所撤除，而我們西方的太平洋沿岸城市正開始派出船隊前往大洋的彼岸。

應該指出，衛三畏的這一見解固然與其傳教士的立場有關，但在西方人中間決非是一種奇特的看法。近代西方人前來東亞通商貿易的物質欲求，往往是與將東亞各民族加以「改宗」和「文明化」的精神衝動交織在一起的，因為他們認為基督教是高等宗教，工業文明是高等文明，代表着真善美。而通商貿易不僅可以推銷工業產品和採購原材料，還可藉以輸出西方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以及精神文化。

衛三畏在此提到的日本鎖國政策，具體說來，是指十七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德川幕府為杜絕基督教影響和獨佔對外貿易利益而採取的海禁政策。在此期間，僅允許荷蘭和中

國的民間商人來長崎一口通商，僅允許朝鮮國王和琉球國王在德川將軍換代時派遣使節來日本續修睦鄰友好關係，不許任何其他國家的人進入日本，也不許日本人渡海出國。更奇怪的是，即使是因漁船失事等漂流海外的日本人，也不問其情由而一律不許回國。從西方的人權觀念看來，這顯然是不近情理和非人道的。

1837年7月4日，美國奧立芬商社（即同孚洋行）的船隻「馬禮遜」號從澳門啟航駛向日本，試圖將七名日本難民送還他們的祖國。他們是因漁船失事分別漂流到加拿大和菲律賓之後轉來澳門的，衛三畏和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 Gützlaff）等在僱用他們的同時向其學習日語，並將《聖經》的有關章節譯成日語。伯駕（Peter Parker）帶了大批藥物和儀器，衛三畏為謹慎起見未帶聖經和書籍，而郭實臘則先期抵達琉球以待匯合。在衛三畏看來，這是藉以開始與日本友好交往的一個機會，不過最終目的仍在於「擴大文明和基督教」的影響。不過，他們的運氣並不好，在江戶灣以及鹿兒島灣分別遭到了炮擊，徒勞而返<sup>⑩</sup>。這是因為德川幕府早先發布的「異國船驅逐令」仍然有效，沿海藩主對國籍不明的船隻可以進行炮擊而無須半點猶豫（這一「驅逐令」要到1842年才取消）。衛三畏等把事件真相在倫敦、紐約和廣東的報紙上揭露出來後，引起了極大的國際反響。這一事件在日本國內也引起了震動，蘭學家渡邊華山和高野長英等著書立說，批判幕府的鎖國排外政策，因而分別遭到軟禁和終身徒刑的處分。

遭遇海難流亡海外的日本漂流民命運如此，遭遇海難流落日本海岸的美國漂流民命運又如何呢？如上所

近代西方人前來東亞通商貿易的物質欲求，往往是與將東亞各民族加以「改宗」和「文明化」的精神衝動交織在一起的，因為他們認為基督教是高等宗教，工業文明是高等文明，代表着真善美。而通商貿易不僅可以推銷工業產品和採購原材料，還可藉以輸出西方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以及精神文化。

培理將軍在美國被稱為「汽艦之父」。在接受對日外交使命前不久，他已下定「畢其功於一役」的決心。他指揮的美國東印度艦隊在1853年遠征日本時是由四艘軍艦組成，將士近一千人。次年，艦隊由九艘軍艦組成，將士近兩千人。運轉自如的巨大「黑船」兩次出現時，都對日本官民的心理造成極大衝擊。

說，到十九世紀中期為止，捕鯨業是美國的重要產業，因為當時美國照明用的蠟燭和燈盞使用鯨油，大量工業機械的潤滑也靠鯨油，鯨油和鯨骨還是銷路很好的出口原料。由於十九世紀中期美國捕鯨業的主要漁場轉至太平洋北部，光是在日本近海地區作業的捕鯨船每年就有數百艘。當時美國海軍海洋調查船的一名軍官曾形容說，「今天和此時此刻，我國捕鯨船的白帆正把太平洋染成一片白色」<sup>①</sup>。如此眾多的捕鯨船，其中難免有失事的。由於海流的關係，在北太平洋遇難的捕鯨船往往漂流至當時稱為「蝦夷地」的北海道及其相鄰的千島列島南部一帶。「蝦夷地」當時還未開發，與日本本土的聯絡極不方便。而幕府堅持長崎一口通商的外交體制，漂流到日本最北邊的「蝦夷地」和千島的美國捕鯨船員，必須經過長途跋涉移送到最南邊的長崎交給荷蘭商館，等候定期來此的荷蘭商船帶到荷屬東印度的首府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途中遭到監視不說，飲食起居極不方便，加上言語不通和為期漫長，很少美國人能夠經受得住這番煎熬。

比如，1846年在堪察加遇難的「羅倫斯」號的捕鯨船員七人漂流到千島南部以後，經過十七個月才被帶到巴達維亞。又比如，1848年「拉格達」號的十五名船員集體脫逃至箱館（今北海道南部的函館），美國得知這一消息後，當即派東印度艦隊的「普列布」號駛往長崎，經過嚴厲交涉，終於由當地的荷蘭商館作為中介接回了這批船員。不過，這也費了整整十個月時間。因為兩次事件中均有人在拘留和移送途中死亡，在《紐約先驅論壇報》（*The New York Herald*）等加以宣

染報導以後，美國公眾均認為日本是野蠻國家。國會和政府也十分重視保護捕鯨船員的生命財產，企圖尋求永久解決辦法，即與日本簽訂一個友好條約，免得每次海難發生以後興師動眾派軍艦去日本接回難民。

培理將軍在美國與墨西哥的戰爭中軍功赫赫，並因為把當時世界上最新式的蒸汽動力軍艦導入美國海軍，而被稱為「汽艦之父」。在接受對日外交使命前不久，他已下定「畢其功於一役」的決心：一支足以對日本示威的強大艦隊是完成這一使命的必須條件，如果因武力不足而「計劃歸於失敗的話，我自身的屈辱且不說，開始與日本及其附屬島嶼的友好關係、解放那些苦於殘酷和絕望的監禁生活的不幸人們（指遇難的美國捕鯨船員）這一最終目標的達成將被決定性地推遲」<sup>②</sup>。結果，他指揮的美國東印度艦隊經過大西洋和印度洋進入太平洋，在1853年遠征日本時是由四艘軍艦組成，將士近一千人。次年，艦隊由九艘軍艦組成，將士近兩千人。運轉自如的巨大「黑船」兩次出現時，都對日本官民的心理造成極大衝擊。

1854年3月上旬雙方在橫濱舉行會談，培理在標榜美國的人道主義的同時，歷數了日本的「罪狀」：「我國向來以尊重人命為第一來進行國政，所以，自己的國民且不論，即使是其他國家或向無交往的國家，見到其人民因漂流而遭遇困難時，亦竭力營救，予以厚待。而貴國則似乎從來不尊重人命，他國船隻在日本近海遇難，決不營救，靠近海岸時則炮擊防之。又有漂流至日本國者時，被像犯人一般對待，嚴加禁錮。且日本國人民漂流者，為我國人所救而企圖向（貴國）港口送還時，也決不接受，似

乎要將自己的國民拋棄一般」，簡直是「不仁之至」。若不改弦易轍，便是「寇仇之國」，美國將集結戰艦與之「決一雌雄」<sup>⑬</sup>。日方首席代表林緯大學頭則竭力為日本的政策辯解，並表示願意就海難救助進行磋商時，培理則指出：「茲若能成此約，則本國亦無庸別臣奉急命，坐師船而到此矣」，意即條約若能談成，美國就不必在捕鯨船出事時派軍艦千里迢迢來日本救援自己的同胞了<sup>⑭</sup>。

培理隨後遞交了以美中《望廈條約》為藍本而加以簡化了的漢文條約草案，得寸進尺地要日本同意與美國通商，林大學頭則表示，日本物產豐富，無須交易也可以自足。「交易雖為國家利益，與人命則不相關，請勿再勉強提起交易一事。」<sup>⑮</sup>後來，在互換禮物時，美方把火車模型等贈送給日方，並邀請日方上旗艦赴宴，緩和了緊張氣氛。在3月31日簽訂的《日美親善條約》中，日本終於同意開放箱館和下田為避難港，分擔救助漂流民的費用，並給美國以最惠國待遇和十八個月後開設領事館的許可。

## 二 「吉田松陰偷渡事件」及其人權問題

《日美親善條約》標誌着日本與美國官方交往的開始，但並不意味着兩國人民可以自由往來。日本鎖國政策的改變，主要限於對美國船隻和遇難人員的照應。至於日本人渡海出國，當時仍屬大禁。因此，條約簽訂後不到一個月，年僅二十五歲的吉田松陰（名矩方，1830-59）及其同伴金子重輔（1831-55）趁美國艦隊仍在下田港逗留，於夜深人靜時爬上旗艦，企圖犯

禁偷渡美國，成為震驚日本全國的一樁公案。

吉田為何要偷渡美國，事件又是如何展開的呢？其實，清末維新派的黃遵憲早在《日本國志》和〈近世愛國志士歌〉中就介紹過這個有名的故事。而戊戌政變時的梁啟超搭乘日本軍艦東渡亡命後，曾作〈去國行〉，又從吉田松陰及其弟子高杉晉作的經歷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一度改名「吉田晉」以示效法<sup>⑯</sup>。

黃遵憲〈近世愛國志士歌〉自註中的一節如下<sup>⑰</sup>：

吉田矩方，字松陰，長門人。受兵學於佐久間象山。象山每言今日要務，當周航四海，庶不致觀人國於雲霧中。會幕府託和蘭購兵艦，象山又曰：仰給於外，不如遣人往學之為愈也。幕府不納。矩方聞之感憤。時墨艦泊浦賀港，象山實司警衛事，乃密謀夜以小舟出港近墨船，偽為漁人墜水者，墨人救之，乃因請於墨將披理，求附載。披理奇其才，以犯禁故，仍送致幕府，請勿罪。幕府錮之其藩，密書寄象山曰：知時務如先生，今之俊傑也。今之諸侯，何者可恃？神州恢復，如何下手？茫茫八洲，置身無處，丈夫死所，何處為宜？乞告我。矩方卒被刑。維新以來，長門藩士之以尊王立功者，多其門人。

《日本國志》的有關介紹中還提到，「嘗觀披理紀行書，謂矩方聰明，識天下大勢。日本罪斯人真為可惜。」<sup>⑱</sup>由此可知，黃遵憲等在當時的條件下對「吉田松陰偷渡事件」的來龍去脈已有大體上的把握。但是百年之後的今天，日美雙方有關檔案史料的發掘和研究大有進展，加之時代感覺

在1854年簽訂的《日美親善條約》中，日本同意開放箱館和下田為避難港，分擔救助漂流民的費用，並給美國以最惠國待遇和十八個月後開設領事館的許可。這標誌着日本與美國官方交往的開始，但並不意味着兩國人民可以自由往來。日本鎖國政策的改變，主要限於對美國船隻和遇難人員的照應。至於日本人渡海出國，當時仍屬大禁。

吉田松陰〈投夷書〉  
(45×24 cm)。此為  
羅森抄件，收藏於耶  
魯大學斯德林紀念圖  
書館檔案部《衛三畏  
家族文書》中。



吉田松陰的偷渡目的在於前赴美國學習先進軍事技術，標誌着日本的西學開始由蘭學轉向英美學。《海國圖志》於1851年傳入日本後，吉田和他的老師佐久間象山都讀過，對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戰略深表贊同。他們已經認識到蘭學本身的局限，以及借助荷蘭語譯著來了解英國、美國和俄國最新動態的局限性。

和歷史觀的不同，再讀以上介紹就頗感不足了。

以下擬分兩點着重加以分析。

第一，吉田松陰的偷渡目的在於前赴美國學習先進軍事技術，標誌着日本的西學開始由蘭學轉向英美學，這一轉變的歷史意義不可忽視。1854年4月25日偷渡的前一天，吉田已將〈投夷書〉遞交在下田海岸散步的美國軍官。出身長州藩武士階層的吉田和金子在書中自稱「日本國江戶府書生」，並分別使用「瓜中萬二」和「市木公太」的化名，故作謙恭地表示，「生等賦稟薄弱，軀幹矮小，固自恥列士籍，未能精刀槍刺擊之技，未能講兵馬鬥爭之法，汎汎悠悠，玩愒歲月。及讀支那書，稍聞知歐羅巴米理駕風教，乃欲周遊五大洲。」可見其意在赴歐美學習先進的軍事技術。書中又對風馳電掣的「貴國大軍艦連檣來泊」表示讚嘆，並對自己困於鎖國制度無法出洋表示悲哀：

夫跛躄者之見行走者，行走者之見騎乘者，其意之歆羨如何耶。況生等終身奔走，不能出東西三十度南北二十五度之外（指日本列島的經緯度，意思是國土範圍狹小）。以是視夫駕長

風，凌巨濤，電走千萬里，鄰交五大洲者，豈特跛躄之與行走，行走之與騎乘之可譬哉。

書中所謂「及讀支那書，稍聞知歐羅巴米理駕風教，乃欲周遊五大洲」，並非虛言。例如，《海國圖志》於1851年傳入日本後，其中的〈籌海篇〉和美國部分在1854年便得到翻刻，廣為傳布。吉田和他的老師佐久間象山都讀過，對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戰略深表贊同。佐久間不僅有深厚的漢學功底，也是當時日本最有名望的蘭學家。他讀了《聖武記》序言後，曾引魏源為「海外同志」，因為《聖武記》作於1842年7月，而同年11月，他自己也曾向藩主上書建議加強海防。不過，同時也應該承認，近兩百年的蘭學傳統使得日本在順應西潮衝擊時表現較為敏捷。佐久間對當時的世界形勢有深刻認識，謂「露西亞先主彼得（大帝）以荷蘭為師，遂不見劣於荷蘭。而北美人以英吉利為師，終於戰勝英吉利」<sup>⑨</sup>。因而激勵吉田偷渡美國，並為之修改〈投夷書〉。

吉田登上美國軍艦後在紙條上寫到：「吾等欲往米利堅，君幸請之大將。」<sup>⑩</sup>失敗後在獄中據佐久間建議

寫作《幽囚錄》，以記錄這一歷史性的偷渡事件。其中指出②：

荷蘭之學雖大行於世，至於露西亞、米利堅、英吉利的書，未聞有善讀者。現今諸國舶交至吾邦，吾邦人乃可不詳其方言乎。且技藝之流、器械之制，諸國各有新法妙思，經過荷蘭譯撰亦可以觀其概，然何若各就其國之書求之矣。今宜派遣俊才赴各國，購其國之書，求其學術，因立其人（留學歸國者）為學校師員。

這段論述表明，吉田和他的蘭學老師佐久間一樣，已經認識到蘭學本身的局限，以及借助荷蘭語譯著來了解英國、美國和俄國最新動態的局限性。

以往的研究只把1859年福澤諭吉（1835-1901）訪問橫濱時所發的一番感慨作為日本由蘭學轉向英美學的象徵。即當時橫濱開港伊始，上海和香港的英美商社紛紛來此開設分公司，掛出英語招牌。而傑出的青年蘭學家福澤來此參觀，目不識丁，大為震驚，因此下定決心轉學英語，終於成為近代日本提倡西化的主要思想家。因為有蘭學的底子，日本的英美學發展速度很快。據傳，1862年福澤在倫敦見到一位中國學者，兩人在交談中間起對方國家有多少人懂英語。當福澤告知日本有五百人左右時，那位中國學者慚愧地說，中國大約只有十一人會英語③。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英美學更有突飛猛進之勢。1872年中國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共三十人，而日本已於前一年向歐美派出龐大的政府考察團，由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以及吉田松陰的學生伊藤博文等大臣率領。隨行人員中包括五十八名留學生，其中五

位是去美國留學的少女。到1873年，光是東京府一地就在公立學校之外開設了1,130所私立英語學校④。

吉田松陰提倡學習英美要比福澤諭吉早四五年，為甚麼他上述重要主張竟然被人們忘卻了呢？這主要是由於「因人廢言」的緣故。吉田在幕末的政治鬥爭中為反對幕府而鼓吹「尊王攘夷」，而在太平洋戰爭中又被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描繪成反對英美的先驅，因為他鑑於鴉片戰爭和「黑船」衝擊的教訓，確實策劃過先奪取近鄰各國、然後逐個擊破列強的長遠戰略。加上他蘭學造詣尚淺，他的跨越蘭學而轉學英美的主張就不如蘭學家福澤的現身說法來得有說服力。而他在偷渡失敗後所說的一些意氣用事和文過飾非的話，至今還有人用來證明他的目的不是要偷渡美國，而是要謀刺培理將軍。其實，只要看一下他偷渡時行囊中的書籍——《孝經》、《唐詩選掌故》、《和蘭文典》和《譯鍵》——便可知，作為一個自小接受漢學訓練，長大後擔任兵學師範、有着戰略頭腦的人，他是決不會和目光短淺的「恐怖份子」一般見識的。

第二，吉田松陰的偷渡事件給培理出了一個難題，使之在美國的「國家利益」優先還是日本偷渡者的「人權」優先的問題上大傷腦筋，前後一共經歷了三次波折。

第一次波折是關於是否收留吉田和金子兩人的問題。其實，在兩人偷渡之前，培理已從衛三畏處得知在海岸散步的軍官轉交上來的〈投夷書〉的內容，其中有如下懇切的請求：

然而吾國海禁甚嚴，外國人入內地與內地人到外國，皆在不貸之典。是以周遊之念，勃勃然往來於心胸間，而

吉田松陰提倡學習英美要比福澤早四五年，他的重要主張竟然被人們忘卻，是由於吉田在幕末的政治鬥爭中為反對幕府而鼓吹「尊王攘夷」，而在太平洋戰爭中又被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描繪成反對英美的先驅，加上他蘭學造詣尚淺，他的跨越蘭學而轉學英美的主張就不如蘭學家福澤的現身說法來得有說服力。

呻吟踏跣，蓋亦有年矣。……生等熟觀稔察，深悉貴大臣各將官仁厚愛物之意，平生之念，又復觸發。今則斷然決策，將深密請託（託）假坐貴船中，潛出海外，以周遊五大洲，不復暇顧國禁也。願執事辱察鄙衷，令得成此事。生等所能，為百般使役，惟命是聽。……執事幸垂明察，許諾所請，何患尚之。惟吾國海禁未除，以事若或傳播，則生等不徒見追捕召回，勿斬立到無疑也。事或至此，則傷貴大臣各將官仁厚愛物之意亦大矣。執事願許所請，又當為生等委曲包隱，至於開帆時，以令得免勿斬之慘。若至他年自歸，則國人亦不必追窮往事也。生等言雖疏漏，意實誠確。執事願察其情，憐其意，勿為疑，勿為拒。

不過，由於《日美親善條約》剛剛簽訂，有關細則和具體辦法還有待交涉，若因收留日本的偷渡者而造成與幕府的矛盾，對培理來說會是很大的麻煩，甚至有前功盡棄的危險。所以他事先就已決定不予收留，當然也就未照吉田在〈投夷書〉附件中所指示的那樣，在夜裏派小船去岸邊的柿崎村一帶迎接兩人。待吉田等爬上旗艦後，培理本人也未露面，而是讓衛三畏去作盤問。

盤問過程中雙方時而用漢語筆談，時而用日語會話。吉田按要求在紙上寫下兩人的化名即「瓜中萬二」和「市木公太」後，衛三畏當即回到艙內拿出〈投夷書〉加以對照，確認了其身份。據吉田回顧，衛三畏告訴他們：「此事只有大將和我知道，不讓他人知曉。大將和我心誠喜歡。但是在橫濱，米利堅大將和林大學頭已就米利堅天下和日本天下之事互相約束，故難以私下承諾君之請求。應稍等待，

不久以後，米利堅人來日本，日本人來米利堅，兩國往來如同在國內一樣，其道路必將開通，其時機必將到來。且吾等在此逗留尚要三個月，並非馬上返回」，爾等可以在此期間向政府申請出國許可。吉田聽後，再次告知自己是犯禁而來，回去必受誅殺。衛三畏則回答說，現在仍是深夜，趁早回去，應當無人發現。吉田見無法說服，便要求退回〈投夷書〉，衛三畏也不許，曰「留置可也，皆讀得懂」。吉田轉而在紙條上寫下「廣東人羅森」一行字，要求與之見面。衛三畏則說，見他有何用，且現在臥牀睡覺。吉田仍不死心，以爬上旗艦後所乘小船已被風浪帶走，行囊中的文書會被扣留作為罪證，繼續苦苦相求。衛三畏勸說，已決定派小艇將你們送回岸邊，並指示艇長到各處幫助尋找你們的小船。如此周旋近兩小時後，吉田和金子兩人才在無奈和絕望之下離開了旗艦，被遣返岸邊。之後主動向當地的村長自首，隨之被政府拘捕<sup>②</sup>。吉田再三訴諸美方的「仁厚愛物之意」即人道主義，想藉此達到偷渡美國的目的，結果歸於失敗了。

第二次波折發生在吉田偷渡的次日下午。據美國國會文件《培理艦隊日本遠征記》記載，日方派翻譯前來詢問：昨日有兩個發狂的日本人到了美國艦隊的一艘船上，到的是否旗艦，有何不軌行動？美方司令副官為包涵起見，表示並無任何事端發生，同時還向日方翻譯確認了那兩個人平安回到岸上，這才放心。培理為了將大事化小，還特意派了一個士官前去會見日方官員，在對日方的關心表示感謝的同時，指出這樣的小事並不值得調查，因為美方不會作出任何有損互信和違反條約精神的事，沒有日本政府的同意，美方不會把任何一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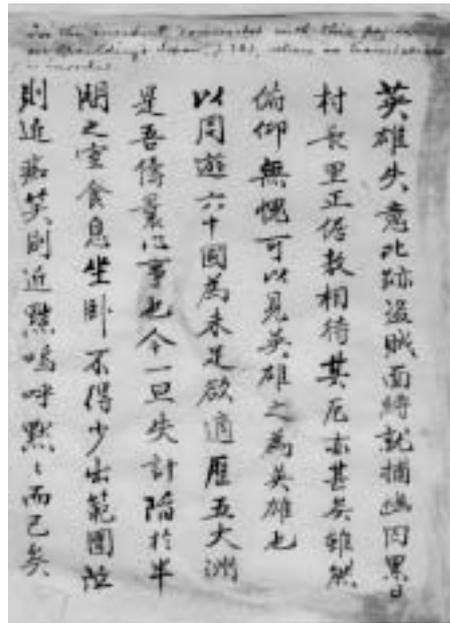
吉田松陰的偷渡事件給培理出了一個難題。由於《日美親善條約》剛剛簽訂，有關細則和具體辦法還有待交涉，若因收留日本的偷渡者而造成與幕府的矛盾，對培理來說會是很大的麻煩，所以他事先就已決定不予收留。吉田再三訴諸美方的「仁厚愛物之意」即人道主義，想藉此達到偷渡美國的目的，結果歸於失敗了。

本人帶走。其實，培理心裏是同情這兩個可憐的日本人(指吉田等)的，因為他們只是想滿足自己對海外的好奇心而已，而這種好奇心又是受到美國人來訪的刺激而形成的。儘管從日本的法律來看他們的行動是有罪的，但美國人並不認為如此。這兩個有教養的日本人為增進知識而敢於冒生命危險，表明日本這個民族是前途有望的。不過，比起這種曖昧的人道主義，培理感到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已經對美國作了許多重大讓步，所以盡可能遵從日本國內的諸多規定是唯一實在的政策。何況這兩個日本人的偷渡動機未必如其所說，他們也有可能是日方派來試探美方的間諜<sup>⑤</sup>。總之，在培理的心目中，佔據着優先地位的始終是對美國「國家利益」的考慮。

第三次波折發生在吉田被拘留在下田監獄時，大約在偷渡後十天左右。隨軍外科醫生等幾個美國軍官在當地散步，偶然看到吉田和金子被關在一個狹窄的木檻裏。吉田見到他們，便在一塊木板上寫了以下一段話來抒發自己的感慨。

英雄失意，比迹盜賊。面縛就捕，幽囚累日。村長里正，倨敖相待，其厄亦甚矣。雖然，俯仰無愧，可以見英雄之為英雄也。以周遊六十國為未足，欲適歷五大洲，是吾儔曩心事也。今一旦失計，陷於半間之室，食息坐臥，不得少出範圍。泣則近痴，笑則近黠。嗚呼，默默而已矣。

這裏的「六十國」是指日本的六十個州。吉田於此再度表明了擺脫鎖國體制、「周遊五大洲」的雄心壯志，並對「未敢翻身已碰頭」的監禁生活表示哀嘆。木板交給隨軍外科醫生後，轉



吉田松陰〈第二次投夷書〉(14×19cm)。此為羅森抄件，收藏於耶魯大學斯德林紀念圖書館檔案部《衛三畏家族文書》中。

到了首席翻譯衛三畏手中。培理在夜間得知這一消息以後，第二天早晨便派衛三畏和他的副官前去確認。然而不巧的是，吉田二人在那天一早已被從江戶來的官員帶走了。獄卒證實他們正是犯禁偷渡的罪人，可能會被嚴加處罰。衛三畏對木檻作了測量，其長約一點八米，寬約零點九米，高約一點四米，兩個成人關在其中不能動彈，難受程度可想而知。衛三畏由此聯想到美國印第安人用以囚禁罪人的木檻<sup>⑥</sup>。得到這一調查報告的培理最後終於動了憐憫心，向日方交涉，希望不要處以極刑，即吉田在〈投夷書〉中和旗艦上再三說起的斬首。在得到日方關於不會導致嚴重後果的保證以後，培理心裏才稍感安慰<sup>⑦</sup>。

吉田松陰手書的木板現在似乎已不復存在，我所發現的羅森的抄件，是被衛三畏小心翼翼地黏貼在自己的親筆日記《培理日本遠征隨行記》的封底內側，可見其十分珍視這一文書。美國國會文件《培理艦隊日本遠征記》收錄了這一文書的英譯，並視其為表現了臨難不懼和安心立命的哲人氣概的一個標本<sup>⑧</sup>。

## 結語

1960年代初期擔任過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總統特別助理的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曾經指出，美國人權外交的衝動始於1849年12月。當時，參議員卡斯 (Lewis Cass) 向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一項動議：中止與奧地利的外交關係，以抗議其對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血腥鎮壓。雖然這項動議未能成功，它卻標誌着美國試圖在世界各地推進人權事業的開端。顯然，美國的人權外交在本質上是與獨立戰爭所孕育、其後又不斷完善的人權觀念密切相關的，同時也是與移民美國的各國人士為改善其出身國人權狀況所作的游說活動分不開的<sup>②</sup>。不過，小施萊辛格的視野並不包涵當時即十九世紀中葉的東亞地區。

其實，1853、54年培理的對日交涉可以說是當時美國人權外交的典型例子，它不僅涉及保護遭遇海難的美國捕鯨船員的生命財產和避免其在滯留日本期間受到非人道待遇的問題，而且涉及漂流海外的日本漁民的歸國權利問題，以及吉田松陰這樣的偷渡未遂者在監禁期間的非人道待遇和所犯罪行的量刑等問題。其結果，不但藉此成功打開了日本國門，也促使日本反省其對內政策以及對外政策中的非人道因素。由此可見，美國在對外交往中標榜人道主義並實行「人權外交」，對改善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去年美國在對伊拉克進行轟炸並實施佔領體制之後，特意邀請各國記者參觀拘禁條件改善之後的巴格達監獄，以展示其人道主義，雖有粉飾其戰爭目的之嫌，卻也可以說是這種事例的一個最新版本。

不過，美國對其國民之人權和利益的重視程度一貫高於對其他國家人民之人權和利益的重視程度，當美國要在其「國家利益」和其他國家人民的「人權」之間作出選擇時，往往有以前者為優先考慮的傾向，這在吉田松陰一再告知犯禁出國有殺頭危險而其偷渡要求仍然被拒一事中有明顯的反映。況且，當美國在對日伸張其國民之人權 (包括捕鯨船員、商人、傳教士及外交官等的權利) 時，其國內仍然存在着奴隸制，即使在南北戰爭以後，猶有嚴重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可見美國本身亦有其歷史所形成的參差不齊的人權狀況，要到二十世紀中葉的民權運動 (Civil Rights Movement) 之後才得到大幅度改善。

1853、54年培理的對日交涉可以說是當時美國人權外交的典型例子。不過，美國對其國民之人權和利益的重視程度一貫高於對其他國家人民之人權和利益的重視程度，當美國要在其「國家利益」和其他國家人民的「人權」之間作出選擇時，往往以前者為優先。吉田松陰偷渡被拒事件就是明顯例子。

## 註釋

① John H. Schroeder,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Antebellum Sailor and Diplomat*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大江志乃夫：《ペリー艦隊大航海記》(東京：朝日新聞社，2000)；岸俊光：《ペリーの白旗——150年目の真實》(東京：毎日新聞社，2002)；井上勝生：《開國と幕末變革》(東京：講談社，2002)；三谷博：《ペリー來航》(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加藤祐三：《幕末外交と開國》(東京：筑摩書房，2004)。

② 見《毎日新聞》，2003年1月11日及8月8日有關報導。陶德民：〈下田密航前後における松陰の西洋認識——米國に残る「投夷書」をめぐって〉，《環》第13號(2003春季)，頁164-84；陶德民：〈下田獄における第二の「投夷書」について——松陰の覺悟に對するペリー一側の共感〉，《環》第14號(2003夏季)，頁423-30。

③ Roger Pineau編，金井圓譯：《ペリー日本遠征日記》(東京：雄松堂，1985)，頁132。

④ 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驅者羅森〉，載《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263-74；陶德民：〈黑船のもたらした広東人旋風〉，載 *Image and Identity*（神戸：神戸大學經濟經營研究所，待出版）。

⑤⑦ Francis L. Hawks, ed,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 (Washington: Beverley Tucker, Senate Printer, 1857), 398-99; 395.

⑥ 最近，我的同事松浦章、內田慶市和沈國威出版了《遐邇貫珍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4），其中包括該雜誌的完整影印、解說和索引，使用十分方便。

⑧ De-min Tao, "Reading Early U.S.-Japan Relations via a Fatal Stowaway: The Dilemmas of Yoshida Shoin's Request and Commodore Perry's Response", forthcoming in *A Symposium in Memory of the Late Marius B. Jansen*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 2004).

⑨⑩ Frederick W.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LL.D.: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889), 197; 93-100.

⑪⑫ 平尾信子：《黑船前夜の出会い——捕鯨船長クーパーの來航》（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94），頁148；174。

⑬⑭ 〈墨夷応接録〉，《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國關係文書付録之一》（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1913），頁538；541。

⑮ Samuel W. Williams 著，Frederick W. Williams 編，洞富雄譯：《ペリー日本遠征隨行記》（東京：雄松堂，1970），頁215註。

⑯ 郭連友：〈近代中國の吉田松

陰認識〉，玉懸博之編：《日本思想史——その普遍と特殊》（東京：ペリかん社，1997），頁437。

⑰ 黃遵憲：〈近世愛國志士歌〉，載錢仲聯箋註：《人境廬詩草箋註》，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287。

⑱ 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83下。

⑲ 佐久間象山：〈小寺常之助に贈る〉，載信濃教育會編：《象山全集》，下卷（東京：尚文館，1913），頁545。

⑳㉑ 吉田松陰：《回顧錄》，載《吉田松陰全集》，第七卷（東京：岩波書店，1935），頁414；415-16。

㉒ 吉田松陰：《幽囚錄》，載《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東京：大和書房，1973），頁49-50。

㉓ 井上清：《日本現代史》，第一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1），頁215。

㉔ 山本博文：《ペリー來航——歴史を動かした男たち》（東京：小學館，2003），頁195。

㉕㉖ 同註⑤，vol. I，頁421-22；422。

㉗ Samuel W. Williams, *A Journal of the Perry Expedition to Japan (1853-1854)*, ed. Frederick W. Williams (Yokohama: Kelly & Walsh, 1910) (即註④日譯本的英文原版), 181-82.

㉘ 同註⑤，vol. I，頁422-23。另參註②陶德民：〈下田獄における第二の「投夷書」について〉。

㉙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Human Rights and the American Tradition", chap. 5 in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6).

陶德民 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懷德堂朱子學的研究》（大阪大學出版會，1994）和《日本漢學思想史論考》（關西大學出版部，1999）。